

跨越海洋

“海上丝绸之路与世界文明进程”

国际学术论坛文选

(2011·中国·宁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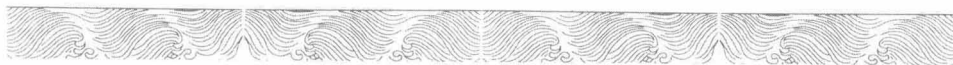
主编：林立群



宁波博物馆
NINGBO MUSEUM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跨越海洋

“海上丝绸之路与世界文明进程” 国际学术论坛文选

(2011·中国·宁波)



主编：林立群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跨越海洋：“海上丝绸之路与世界文明进程”国际
学术论坛文选(2011·中国·宁波)/林立群主编. —杭
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8
ISBN 978-7-308-10822-5

I. ①跨… II. ①林… III. ①丝绸之路—海上运输—
浙江省—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K295.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77057 号

跨越海洋

——“海上丝绸之路与世界文明进程”国际学术论坛文选(2011·中国·宁波)

林立群 主 编

责任编辑 陈丽霞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4.25

字 数 590 千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0822-5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宁波博物馆“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任：林立群

副主任：纪云飞

编 委：纪云飞 李 军 林立群 莫意达

钱 路 龚纓晏 魏 鸣



前言

林立群

位于中国海岸线中部的宁波,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一个主要港口城市,是东方海洋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早在 7000 多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时期,这里的居民就已经与海相伴,以海为生。汉晋时代,宁波就已经与“海上丝绸之路”开始发生联系。唐朝,宁波的行政中心迁移到奉化江、姚江和甬江交汇的三江口后,与海外的交往更加便捷、频繁,宁波与日本之间出现了固定的“南路航线”。同时,中国南北交通的主动脉大运河也延伸到宁波,使宁波成为大运河的出海口,宁波港也获得了广阔的腹地。大运河与“海上丝绸之路”在宁波会聚,奠定了宁波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独特地位。宋朝政府在宁波设立了专门管理海外贸易的市舶司。宋朝与高丽之间的外交往来,主要是通过宁波口岸进行的。明朝,宁波是官方指定的对日本贸易的唯一合法港口。清朝康熙皇帝统一中国后,设立了四大海关,其中浙海关就设在宁波。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海外货物与文化源源不断地流入宁波,而越窑瓷器、茶叶、典籍和建筑艺术等则通过宁波港远输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及印度洋地区,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南则闽广,东则倭人,北则高句丽,商舶往来,物货丰衍”概括了当年宁波海外贸易的盛况,“海上丝绸之路”对古代宁波的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各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今天,宁波的发展与繁荣依然与海洋息息相关。2011 年,宁波港的集装箱吞吐量已跃居中国大陆第 3 位,全球第 6 位。当今宁波已成为著名的国际港口城市。宁波市在重视经济建设的同时,也十分注重“海上丝绸之路”相关遗址、遗存和文物的保护工作,重视“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2001 年 12 月,在宁波召开了“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通过了《宁波共识》,呼吁广州、宁波、泉州等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的城市联合进行“海丝申遗”。也就是从 2001 年开始,宁波每年都举办“海上丝绸之路文化节”,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公众对“海上丝绸之路”的了解与认同。

经过 10 年的努力,“海上丝绸之路”在宁波已变得家喻户晓,人所皆知。就全国而言,也出现了几个可喜的变化。第一,各相关城市都在积极开展“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第二,考古事业蓬勃开展,尤其是水下考古新发现越来越多。第三,学术研究不

断深入,学术成果大量涌现。第四,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各相关城市应当携起手来,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在这种背景下,我于2010年年底出任宁波博物馆馆长。上任伊始,我们即将“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置于优先考虑的突出位置,精心筹划相关活动。2011年5月,在宁波市人民政府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战略合作的框架下,宁波博物馆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联合成立了“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着手组织开展《20世纪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学术回顾》课题研究,筹办“海上丝绸之路与世界文明进程”国际论坛,筹划《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精品联展》。

2011年12月,在宁波第十一届海上丝绸之路文化节期间,蓬莱、扬州、宁波、泉州、漳州、广州、北海等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城市政府的分管领导聚首宁波,共同签署《新机遇、新挑战、新跨越——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七城市联合申遗行动纲领》,积极推动“海丝”联合申遗工作的开展。

2011年12月10—11日,“海上丝绸之路与世界文明进程”国际论坛如期在宁波举办。本论坛由中国社科院和宁波市人民政府主办,浙江省文物局协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宁波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宁波博物馆(“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承办。来自中国、韩国、日本、加拿大、法国、意大利等地的近40位专家参加了本次论坛,其中有的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辈学者,有的是活跃于学界的学术骨干,也有的是近年来脱颖而出的后起之秀,可谓老中青三代齐聚,国内外名家云集。

本次国际学术论坛所讨论的主题比较广泛,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关于海洋文化及“海上丝绸之路”的理论问题;(2)关于“海上丝绸之路”南海航线的研究;(3)关于“海上丝绸之路”东海航线的研究;(4)关于沿海港口与海防制度的研究;(5)关于文化交流、宗教传播与民俗信仰的研究;(6)关于新发现的明代航海图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本次论坛代表的发言次序,就是按照这六个方面安排的。本论文集集中的文章,则按照各位学者的发言顺序编排。

在本次论坛上,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出发,运用考古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材料,就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且发表了真知灼见。他们独到的见解,反映了国内外学术界在“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的新成果,必将推动相关研究的开展。读者们可以在这本论文集中感受这次论坛的学术价值。

论坛结束后,我们组织了一个专门的小组,对所有论文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最终选取其中一部分汇编成书,正式出版。有几篇论文,虽因种种原因未能入选,但依然是本次论坛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为本次论坛增光添彩。我们本来计划这本论文集于2012年上半年出版,由于一些专家对自己的文章推敲润色,反复修改,致使未能如期交稿。本论文集的正式出版也只能略略延后。有些论文中,本来配有许多精美附图。但由于印刷排版的技术原因,最后有的附图或被缩小,或被省略,在此特致歉意。

本论文集是宁波“海上丝绸之路与世界文明进程”国际论坛的主要成果之一,反映了国内外学术界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新研究进展与研究动态。我在此向光临本次论坛的所有学者表示诚挚的感谢。由于时间较短,论文所涉及的范围又较广,本论文集中可能存在着





这样那样的错误,敬请读者指正。

2011年12月在宁波召开的“海上丝绸之路与世界文明进程”国际论坛是一次学术盛会,我真诚地期待着国内外的学者能够在不久的将来再次相聚宁波,共同研讨“海上丝绸之路”,促进学术进步,共同创造条件,推进“海上丝绸之路”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共同弘扬“海上丝绸之路”精神,推动海洋文明的发展。

二〇一二年八月六日

目 录

梁嘉彬先生与中国沿海边疆史研究	章文钦(1)
当中国海洋意识遭遇大陆文化——以闽南人的海洋发展夭折为例	庄国土(8)
“海上丝绸之路”理论界定若干重要问题探讨	施存龙(18)
关于中国海洋文化遗产的几个问题	曲金良(33)
海上丝绸之路与越窑陶瓷文化	林士民(41)
钱币外流、金银交易与外销瓷——从考古发现看明前期南海贸易	李庆新(48)
南海考古与海上丝绸之路	姜 波(61)
广州十三行与影响世界的茶叶之路	冷 东 鲍 琴(67)
清代潮州对外贸易研究	王元林 刘 强(78)
Srivijaya, China and Chinese Merchants (10th—12th Centuries)	
.....	苏尔梦(Claudine Salmon)(92)
日本佛教的律学、律仪的形成和发展——以唐高僧鉴真和入唐日僧最澄为中心	
.....	王金林(111)
The Coin Conundrum in Twelfth Century Japan	
.....	Mikael S. Adolphson(122)
17~19 世紀の九州陶磁器生産における中国陶磁器の影響	渡辺芳郎(142)
唐~元代における日中交通路の変遷	榎本 涉(151)
海上丝绸之路与韩半岛	郑守一(167)
明末清初浙江与日本九州之间的海上交往——以日本德川幕府末期外交档案史料汇编	
《通航一览》的记载为中心	钱 江(177)
宋元时代浙江、福建沿海的巡检司——兼论元澎湖巡检司	刘迎胜(186)
16 至 19 世纪中期欧洲人对中国沿海活动的了解	柯 兰(Paola Calanca)(200)
关于唐代市舶使的一些意见	李锦绣(211)

首论罗懋登《西洋记》对郑和下西洋规模的夸大·····	张 箭(222)
明马欢《瀛涯胜览》记述的船舶史料及学术价值·····	时 平(238)
明清之际天主教艺术在澳门及中国内地的传播·····	汤开建(245)
海上丝绸之路和婆罗门教之来华·····	严耀中(269)
“海上丝绸之路”与浙东妈祖信俗拓展·····	黄浙苏(276)
The International Role of the Zheng Maritime Organization in 17th Century East Asia: A Survey ····· 白蒂(Patrizia Carioti)(285)	
简论宁波双屿港短暂的历史辉煌·····	金国平(325)
世界的宁波:16—17 世纪欧洲地图中的宁波港 ·····	廖大珂 辉 明(330)
《顺风相送》作者及完成年代新考·····	陈佳荣(343)
略论《明代东西洋航海图》·····	朱鉴秋(359)
明代《雪尔登中国地图》图类定位及其在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的学术价值 ·····	孙光圻 苏作靖(367)
试论国外新近发现的一幅明代航海图·····	龚纓晏(377)





梁嘉彬先生与中国沿海边疆史研究

中山大学 章文钦

一、引言：从西北史地之学到中国沿海边疆史研究

蔡鸿生先生《〈陈寅恪集〉的中外关系史学术遗产》一文有“连环性——历史联系的网络式理解”一节，指出：“《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的下篇，取名‘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可说是陈寅恪先生‘以现代国际观念来看唐史’的典范性的学术演示。内云：‘所谓外族盛衰之连环性者，即某甲外族不独与唐室统治之中国接触，同时亦与其他之外族有关，其他外族之崛起或强大可致某甲外族之灭亡或衰弱……盖中国与其所接触诸外族之盛衰兴废，常为多数外族间之连环性，而非中国与某甲外族之单独性也。’这种对历史联系的网络式理解，把双边与多边结合起来，构成一个互动的视野，有特别重要的意义。”^①无独有偶，长期致力于中外史地考证的专门之学，无论南海史、西域史还是突厥史均卓有建树，被陈寅恪先生视为“南学”代表的岑仲勉先生，也认为历史上的中外交往是一种“蛛网式”结构。

受陈、岑二老的启发，蔡鸿生先生提出：历史上沟通中国与世界文明的海陆交通，是一种“网络式”结构，称为海陆交通网络。这个网络呈现为双边与多边的关系，联系着许多国家和民族，陆路的商队城，海路的贸易港，形成一张撒开的巨网，犹如现代科技所形成的互联网，波斯湾是海陆两路的连接点。中外国家民族之间，在进行经济贸易的同时，也进行政治、文化的交流；经济贸易的商品，包括中国的商品与世界各国的商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结合在一起进行交流。因此，所谓“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无非是海陆连成一体文明网络。

自19世纪中叶以后，中外史地考证逐渐发展成为一门具有国际影响的专门之学，在中国学者方面，先是有林则徐、魏源、梁廷枏、徐继畲诸人的提倡，继而有徐松、何秋涛、李文田、沈曾植、岑仲勉、冯承钧、张星烺、向达、李长傅、陈序经、苏继庠、姚楠、戴裔煊、韩振华、全汉升、朱杰勤、章巽等几代人的努力，从西北史地之学到中国沿海边疆史的研究，成绩斐然，蔚为大观。

从西北史地之学到中国沿海边疆史的研究，是晚清边疆危机的产物。魏源《海国图志》谓英人“洞悉中国情形虚实，而中国反无一人瞭敌情伪，无一事师彼长技，喟矣哉！”又因当时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已经深入东南亚各国，认为“志南洋所以志西洋”。朱杰勤先生指出：“其

^① 蔡鸿生：《中外交流史事考述》，大象出版社2007年版，第420—421页。

最终目的仍是研究国际形势，反对殖民主义继续侵入亚洲。……他研究东南亚的目的是警惕西方殖民者以东南亚为侵略基地进犯中国，并且以英国殖民主义为19世纪亚洲人民的敌人，希望国人以敌情观念出发来进行研究。”^①研究西北史地之学和中国沿海边疆史的前辈学者，正是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本着对国家民族高度的责任感和发自内心的忧患意识来进行这门学问的研究。笔者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追随戴裔煊先生研究澳门史，多次面聆教诲：“我研究澳门史，就是为了证明：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完全有权收回澳门。”这是经历百年屈辱的前辈学者，为中华民族留下的一宗宝贵的精神遗产。

梁嘉彬先生也是一位对中国沿海边疆史的研究卓有成就的前辈学者。近年笔者在其亲属梁承天、梁承邺诸先生的支持下，承乏《梁嘉彬史学文集》的整理校订工作，在这部即将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五卷本的文集中，第二卷《南海交通与澳门史》和第三卷《东海交通与台湾史》，便是梁先生的中国沿海边疆史研究成果的主要体现。

梁先生出生在一个具有爱国主义传统的士大夫家庭。太高祖经国、伯高祖纶枢，嘉道间承充广东十三行天宝行商，应为其日后致力于广东十三行与中国沿海边疆史研究的最初动因。高祖同新，道光进士，官至顺天府尹，鸦片战争后曾上疏谓：“夷人之情，不知止足；愈畏事则愈生事，能处事乃能无事。若沿海边疆巨果能内修法度，以全国体，毋失之过柔；外示怀柔，以显皇仁，毋失之过刚。刚柔适中，则不战而胜，海内可以久安矣。”^②诚正大得体之论。曾祖肇煌，咸丰进士，官至顺天府尹、江宁布政使、护理两江总督，为左宗棠得力助手，“自幼喜边疆国防之学，对云南回乱、新疆回乱、中法越南战争皆致力。因协饷边防有功，赏加头品顶戴”。^③祖庆桂，光绪举人，官至内阁侍读，与康有为为兰契交，曾参加“公车上书”，倡率保护粤汉铁路运动。父广照，光绪间留学日本东京法政速成科，官至法部员外郎，曾奏呈保护粤汉铁路案。嘉彬先生和胞兄方仲先生自幼便受这种爱国主义传统的熏陶，青少年时代又经历世变和国难，对其兄弟两人的一生治学旨趣和人生价值取向产生深远的影响。下文将从嘉彬先生对中国南海边疆史与东海边疆史的研究两个方面，来论述其对中国沿海边疆史的研究。

二、梁嘉彬先生与中国南海边疆史研究

1922年，嘉彬先生年十三，随父入京，曾作诗云：“仆从南海来，安知中原病？嗟我爱国心，实属遗传性。”1925—1928年，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大学预科，任南大预科同学会研究组组长，曾邀请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的南开大学蒋廷黻教授在“五九”国耻纪念日演讲《二十一条的背景》，听后深受感动。1928年夏，考入清华大学政治系。次年，蒋廷黻教授应聘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嘉彬先生便由政治系转入历史系。1930年，清华同学组织“中国边疆问题研究会”，在《华北日报》开辟《边疆周刊》，先生从大学二年级到四年级担任总编辑，并发表不少关于满蒙及西藏的文章，其中多半讨论东北铁路问题，揭露日本对满蒙的侵略野心。1929年，中东铁路发生中俄武力冲突，先生刚好完成一篇三万字的长文《中东铁路问题

① 朱杰勤：《中外关系史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页。

② 梁鼎芳修，丁仁长纂：《番禺县续志》，卷一九《人物》。

③ 王树槐：《学人简介：梁嘉彬》，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1987年第3期，第62页。



之研究》，由天津《国闻周报》破例连载发表。

正当嘉彬先生对东北兴趣最浓的时候，蒋廷黻先生向他提出告诫：“你的文章我都看到了。文章不少，但你自问有哪一篇是有永恒的价值呢？……你是广东人，广东的国际关系最是繁复，可供研究的题目未免太多，你何不研究广东的国际关系呢？”^①

嘉彬先生原先对广东国际关系的史料也很有兴趣，听了蒋先生的话，便把研究兴趣从东北转移到东南去了。他首先研究澳门问题，因为这是中国与欧洲直接交通历史的开端。他于1931年春在《清华周刊》第35卷第4期发表一篇文章，题为《Lampacao考》。Lampacao是葡萄牙人在1521年被中国官军驱逐以后，1557年入居澳门以前，用来私通中国贸易的一个据点。当时一般中国参考书说是电白港。先生将西人龙思泰(Andrew Ljungstedt)、卫三畏(S. Wells Williams)的著作与明代郑若曾编、邓钟重编的《筹海重编》和郭尚宾《郭给谏疏稿》等书互相对证，考证出Lampacao是距离澳门不远西南海中的一个岛，名叫浪白滢，也称浪白澳或浪白洲。这是先生研究南海边疆史的开始。1932年3月又在《清华周刊》第37卷第5期发表《广东十三洋行考序篇》，甚得陈寅恪、向达等先生的好评。而清华同学则送他一个外号，叫做Lampacao。

1932年夏，嘉彬先生自清华大学毕业南归，任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编辑员，广东十三行与澳门问题的研究几乎齐头并进。到1934年赴日本留学之前，已完成《广东十三行考》一书的大部分，并于同年1月在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第2卷第3、4期合刊发表长篇小说《明代中葡交涉史料——〈明史·佛郎机传〉考证》。

《〈明史·佛郎机传〉考证》是嘉彬先生关于澳门问题研究的一篇重要论著。此文通过对康熙间王鸿绪《明史稿·佛郎机传》(实际作者为尤侗和万斯同)的考证，研究明代中葡关系和澳门史。该篇每引一段传文，加一段按语，将中国文献与西方文献互相印证，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来研究中国领土澳门的历史，考核史实，补充阙漏，订正差失，探讨并解决了澳门历史上的一些疑难问题。该书堪与张维华先生《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中的《〈明史·佛郎机传〉注释》和戴裔煊先生《〈明史·佛郎机传〉笺正》并称为《明史·佛郎机传》三大研究著作。1968年台北学生书局出版《明史论丛》之七《明代国际关系》，将此文全篇收入，主编包遵彭在《导论》中誉之为“当年研究斯学者开山之作”。

1935年，嘉彬先生考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东洋史科大学院，仍未忘情于澳门问题的研究，这段时间留下读书笔记《清代澳门概说》。1937年4月研究期满(相当于新制获硕士学位)，便用澳门历史交了研究论文的卷。

抗战胜利后，全国各地掀起收回外国租界和租界地的热潮，嘉彬先生更以满腔热情关注和研究澳门问题。1945年12月在南京《建国周报》发表论文《澳门悬案有早日解决的必要》，1947年6月5日和6日又在台湾《新生报》发表论文《通论澳门在历史上条约上的地位》，论证澳门的主权始终属于中国，中国政府应早日收回澳门。后一文曾被广州《大光报》和南京《中央日报·文史周刊》转载，1969年收入台北正中书局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论丛》第二辑第七册《边疆》。该文的主要理论是：澳门只是租界(Foreign Settlement，或称外国居留地)，而非租借地(Leased Territory)，无租借年限而有永租性质，但权利和义务必须相对应，葡人获得永租权利，先得缴纳地租，继而协助鸦片征税。假如政府要收回澳门，对澳门在历

① 梁嘉彬：《中国近代外交史和中外关系史的学习兴趣》，台北《中国一周》第985期(1969年3月)，第4页。

史上条约上的地位必须先认识清楚,不可人云亦云称之为“租借地”。中国只须将澳门整个收回,而无须再争执如何划界。1888年中葡《北京条约》早已废止,葡人在澳门的权利仅有1887年中葡《里斯本草约》为其护符,中国现在要否认葡人在澳门的特权,只须宣布废止中葡《草约》,便可成功。可以说,这是中国学者中第一个为收回澳门提供理论依据。

嘉彬先生童年在香港上学,曾受辱于英兵和印度警察,对英国殖民主义的侵略行径,早怀义愤。抗战胜利后不久,先生便于1945年9月1日在《光明周刊》撰文《请英国考虑放弃香港》。1947年,英国藉口扩展启德机场,建造九龙军事基地,勒限逼迁仍属中国领土的九龙城内的中国居民,先生于1947年12月14日在台北《公论报》撰文《请认清“九龙城”、“九龙租借地”和“九龙割让地”的区别》,据理抗争。文中略谓:“九龙城在九龙半岛内,与租借地有城墙为界,城址甚小,但常被民国人民骂作外交无能的清朝政府倒始终不肯再放弃权利,最初还照旧遣派官员驻扎城内,黄龙旗在城内和英国旗在城外隔墙抗礼,后来因大费来维持面子终究不上算,才把官员撤归宝安,但从十九世纪末年直到如今,英国势力始终不能越城墙一步……这座城和在威海卫租借地内所保留的土城一样,都曾受过我的专程拜访,前后五次,徘徊不忍去。”

台湾光复后,嘉彬先生于1946年1月赴台,先后任职于台湾省长官署教育处、省编译馆、教育厅,嗣后又兼任台北《新生报·史地周刊》和《中华日报·海岛问题双周刊》(后改名《海岛学术双周刊》)主编。在此期间,发表不少论文,多为有关中国海岛问题,尤其是南海诸岛;或为揭露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以及琉球、台湾先史伪说的原委。兹先论述其与中国海岛问题,尤其是南海诸岛有关者。

嘉彬先生于1948年8月19日在台北《中华日报·海岛问题双周刊》第一期撰文《海岛问题与中国》,略谓:“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列强的眼光莫不注视着海岛……抑我国自经胜利后,收复台澎,建设琼崖(海南岛),经略南海诸岛(东沙、西沙、中沙、南沙诸岛),筹划海上防线,整顿国内外航路,刷新中国与邻国外交,在在皆有待政府与学者间密切之商榷,通力之合作,然后始可于事有济。此种商榷,此种合作,今后十九将偏重海岛问题方面,过去国人之谈国事者,多仅着眼于大陆方面,对于海岛问题,甚少有人肯作专精之研究。然则此种研究在中国,既是新颖,更是急需。”复谓:“尝论中国生命之一线盖在海岛,宜与大陆受同等重视。二千年来,中华民族常在无政府保护状态下源源东渡南下移殖,东海、南海无一不是我人所开之‘天’,所辟之‘地’,我人之发现南北太平洋盖早在二千年前。……历史证明中国应为海权国,国人今后眼光允宜多多注视海上,而不应以大陆国民自限。”此文应为《海岛问题双周刊》的发刊词,关于中国海岛问题,凡所论说,皆为正大得体之论,半个多世纪之后重读此文,尤令人佩服作者眼光的超前性。

《海岛问题双周刊》所发表的嘉彬先生关于南海诸岛的论文,有第6期(1948年12月24日)《记东沙群岛》和第12期(1949年8月22日)《南海诸岛礁中外新旧名称对照表》。前者依据中日文献十余种,简述东沙群岛的位置、气候、沿革和国际交往、建设要点、物产一般;后者列出南海诸岛150多处岛礁的新名、旧名、英名、日本名,并以《备考》注明其经纬度及物产、沿革,以方便读者和研究者。

1971年7月,菲律宾总统突然发布谬论,对一向属于中国的南沙群岛之主权提出异议。嘉彬先生时任台北政治大学“外交”研究所教授,正在海外旅行,利用手头所搜集到的资料,写成《南沙群岛是中国领土》一文,作为政大讲义《中国国际法》的参考教材。文中历数菲律





宾对南沙群岛久思染指,在1946、1950、1956年皆曾对南沙群岛有不当企图。最后指出:“南沙群岛不论在历史、使用及有效管领方面,都是中国的领土,不容置疑!”

1974年1月,越南阮文绍政府突发对西沙群岛之主权要求。嘉彬先生又迅速作出回应,撰成《通论南海诸岛礁——唤国魂,告友邦》专文,刊于同年4月台北《中华杂志》第12卷第129号。文中起首谓:“在广东省之南,越南之东,菲律宾群岛之西,婆罗洲之北,横亘于大南海之中者,有我国东沙、西沙、中沙及南沙诸岛礁之存在。其海域范围广阔,关系于海权者至巨。”继而根据中外文献数十种,详考东沙、西沙、中沙及南沙诸群岛之历史及现状,证明这些岛屿都是中国的领土。复谓:“余每以收音机听取气象报告:‘东沙岛海面,东北风……’不禁凄凄然而悲,渊渊然而思,深念南溟之浩瀚,将士之劳苦,又不知余之海洋发展夙愿将以何日始克达成矣!”“近世各国皆行霸道以自利己国,罔顾仁义道德。海岛主权争执,往往为战后东南亚新兴国家之命运赌注。……越南、菲律宾因欲海洋发展,竟不惜藉口向我海岛冒险,向我政府挑衅。……诸岛之重要性主要在战略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海军以此为南进基点,东控菲律宾,西侵中南半岛,南攻马来群岛,无往不利。尚望当局多加留意。”40年后,南海诸岛主权争端又起,而且仿佛又闻到火药味,作为对南海诸岛拥有无可辩驳的主权之中国政府和人民,可以从嘉彬先生当年的论证中受到启发。

三、梁嘉彬先生与中国东海边疆史研究

梁嘉彬先生与中国东海边疆史的研究,与其赴日本留学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嘉彬先生原想赴法国留学,因受蒋廷黻先生之鼓励,决定赴日本留学,而且一定要考进东京帝国大学。1935年4月考上东京帝国大学东洋史科大学院,受东洋史主任和田清教授指导。和田清教授为天皇御讲,在日本学术界地位很高,对嘉彬先生十分欣赏。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时,嘉彬先生正在攻读博士学位,和田清教授加以强留,谓他人可去,汝决不许回国。但嘉彬先生毅然中断在日本的学业,与正在日本考察的胞兄方仲先生,于8月间私行回国,共赴国难。他常说:“我有留学日本的经验,但我不是亲日派。”

留学日本以后,嘉彬先生的主要学术研究兴趣,从南海中外交通贸易史转移到东海中外交通发现史方面。促成这一研究兴趣转移的主要原因,同样基于对国家民族强烈的责任感。先生在1993年赐函笔者谓:“国人皆知日本武力侵略中国为可恨,而不知日本伪造篡改朝鲜、琉球、台湾及中国历史为可厌也。”作为中国学者,先生感到有责任揭露某些日本学者伪造东方各国历史的臆说,为此不惜穷数十年之力,潜心研究。其中对中国东海边疆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琉球、台湾及钓鱼岛诸问题,相互之间又有密切的关系。

主编台北《中华日报·海岛问题双周刊》期间,是嘉彬先生研究琉球、台湾问题的一个重要时期。关于琉球问题,该刊所载先生论文有第3期(1948年9月24日)《琉球同胞!请让我报告:我对你们的认识、同情和关切》,第21期(1949年9月11日)和第23期(1949年10月10日)《论〈隋书〉“流求”》;以及第9期(1949年2月25日)喜友名嗣正著、嘉彬先生译补《琉球亡国史谭》一、二,第10期(同年3月11日)、11期(同年3月26日)和第12期(同年4月8日)喜友名嗣正著、嘉彬先生注《琉球鸟瞰》上、中、下。关于台湾问题,该刊所载先生论文有第2期(1948年9月9日)《台湾问题与美国》,第4期(1948年10月22日)、5期(同年12月11日)、6期(同年12月24日)和8期(1949年2月11日)《台湾通考》一至五,第25期

(1949年11月7日)《台湾岛的发现(一)》《揭破日本“台湾论者”的阴谋诡计》等。

1955年至1963年,嘉彬先生任教于台中东海大学,除了讲授中国近代史、中日关系史和中外交通史外,并继续研究琉球问题和台湾问题。1960年冬至1961年春,访问琉球大学,环游冲绳、久米、宫古、石垣各岛搜集资料。1962年,任美国夏威夷大学客座教授和东西文化中心高级访问学人,和阪卷骏三等三位专家共组琉球研究所,研究琉球问题。1965年,东海大学将先生在这一领域的重要论文20篇辑成《琉球及东南诸海岛与中国》一书,凡30万言,由哈佛燕京学社资助出版。

嘉彬先生此书,较其成名作《广东十三行考》用力尤深,在学术上自有其重要贡献。先生在1987年8月补识谓:“此书虽以琉球研究为主题,而其实牵涉学术研究范围极广,各方追探对象极深,与中国海洋发展历史极远,均须彻底检讨。于是乃有人海工具技术方式起源问题之提出,乃有韩国、日本、琉球、台湾、菲律宾诸地史前开辟问题与中国海洋发展关系有无之辨证,更而进求亚、美、欧、澳诸族史前关系及交通路线之点破,著者数十年劳绩或在此焉。”

此书在学术上的一大贡献,是对琉球、台湾先史的辨正。先是有法国、荷兰学者,不知中国有同地异名,同名异地之例,而以《隋书》“流求”为台湾者。“梁先生留日时,见日本学者又存心作伪,或故意屈从西人之说,将台湾、琉球两地的先史混为一谈,考其用心,一欲消灭琉球之国史,二欲与台湾拉上移民关系,三欲借此毁蔑中国之航海技术与工具,间接掩饰徐福抵达日本之事实,梁先生不敢苟同,暗中反对其师和田之说。”^①

此书在《三国时孙权所伐夷州确为琉球而非台湾之证据》、《从纯学术立场论〈隋书〉“流求”答台湾论者》、《论“隋书流求为台湾说”的虚构过程及其影响》、《论〈隋书〉“流求”与琉球、台湾、菲律宾诸岛之发现》、《论〈隋书〉“流求”与台湾、琉球、日本海行记录》等论文中,极力揭露日本学者制造《禹贡》之“岛夷”、《史记》之“三神山”、《汉书》之“东鯷”、《三国志·吴书·孙权传》之“夷州”、《隋书》之“流求”、《唐书》之“流鬼”、《宋史》之“流求”、《元史》之“瑯求”,皆为台湾之说的险恶动机。本着“当仁不让于师”的精神,另立己说,略谓:“日本学者的论文,有一共同前提:中国航海技术幼稚,中国大陆与台湾、澎湖交通易,与琉球、日本交通难。此种前提,纯以路程远近衡之,而忽略了风向及潮流的因素。风帆时代,航海之难易,不能概以路程远近衡之,应考虑风向与潮流两因素,以此视之,中国与琉球交通亦易,由福建闽江口至琉球,五天可到。再加上历史文献所述‘流求’情况,证明《隋书》之‘流求’,绝非台湾,而是今日之琉球。”^②

此书通过对秦汉之际以前方士入海及徐福东渡日本史实的研究,指出《史记》所载的“海上三神山”,瀛洲应指琉球,方丈应指朝鲜半岛南面的济州岛,蓬莱应指日本。又在喜友名嗣正原著、嘉彬先生译补的《“琉球舜天王为日人血胤说”正谬》一文附案谓:“余于十数载前研究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读日人诸著如新井白石《南岛志》、币原坦《南岛沿革史论》等,皆谓琉球王舜天为日人源为朝之后,颇觉其事可疑。其后又读日人某著《成吉思汗源义经也》一书,始恍然悟其必为虚构。……据日人此种著述,谓源为朝(叔)南渡琉球,则遗孤而为琉球始祖舜天氏,谓源经(侄)北渡虾夷,展转窜入北亚,则举义兵而为蒙古太祖铁木真(成吉思汗),其裔更统一中国,囊括欧亚。是则琉王舜天亦即元帝铁木真之从兄,而同出自日本源氏,皆立功异域,开国称尊,有此理耶?其不值识者一哂也,明矣,他复何辨?”^③

①② 王树槐:《学人简介:梁嘉彬》。

③ 梁嘉彬:《琉球及东南诸海岛与中国》,东海大学,1965年,第342—343页。





关于近世琉球的历史,嘉彬先生译有喜舍场朝贤的《琉球亡国实录》(未刊稿)。复有长篇论文《琉球亡国中日争持考实》,刊于台北《大陆杂志》第48卷第5、6期(1974年5、6月)。文中据中、日、琉及西方文献,揭示日本灭亡琉球的历史真相,以及李鸿章工于谋身,拙于谋国,对日本的进逼妥协退让,终于导致有两千年历史、与中国有数百年宗藩关系的琉球为日本所灭。该篇论文实为先生晚年研究琉球问题的力作。

根据1943年12月中、美、英三国首脑的《开罗宣言》:“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日本亦将被逐出其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琉球即属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嘉彬先生赴台后,与琉球革命同志会会长喜友名嗣正(汉名蔡璋)等有所联络,谋划琉球归属中国,并撰文《论琉球归属问题》,刊于1953年10月《自由中国半月刊》第9卷第8期。

而在此文之前,嘉彬先生在前引《海岛问题与中国》一文中,已申其琉球归属中国之说,略谓:“琉球在对日和会席上,是一大问题。中国必欲收回,苏联亦不欲美国久占。实则,日本占领琉球,并无正式条约根据。《波斯坦宣言》已将琉球群岛摒于日本领土之外。以地理而论,琉球无独立资格;以历史而论,琉球应归还中国。……此次战争,此等岛屿未曾经过任何战争,其地位适在台湾之东,与台湾连成一气,管理最易,又在战略主场,此等岛屿自美国视之,当绝无价值。”嗣以东亚国际形势发生变化,琉球终成今日之局,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嘉彬先生关于台湾问题的论文,除见于《海岛问题双周刊》和《琉球及东南诸海岛与中国》之外,还有《光复前后的台湾中等教育》,刊于《台湾月刊》第1期(1946年1月);《〈台湾〉本省的航务问题》,1947年2月2日《台湾日报》社论;《关于〈台湾〉本省的“历史教育”》,1947年2月4日《台湾日报》社论;《从中国地方志看台湾物产》,1947年7月8日台湾《新生报》副刊《史地周刊》第10期;《台湾先史新考》,《旁观杂志》第11号(1951年11月)和《小琉球考》,《台湾文献季刊》第19卷第1期(1968年3月)等。先生在台湾生活了50年,对台湾问题的研究,可以说是“近身之学”。而在钓鱼岛问题上,先生有《从明清两代中国、日本、琉球文献看钓鱼台群岛问题及琉球问题》,刊于台北《食货月刊》1971年6月号,论证钓鱼台是中国的领土,为中国学者关于这一问题的较早论著。

四、结 语

1983年3月28日,台北《民生报》发表该报记者王震邦的专访《冷眼看冷暖,铁函存史实——梁嘉彬墨痕常蕴泪痕》,题目之典据,出自嘉彬先生的诗:“输人万事有何颜?只为穷经双鬓斑。欲铸铁函存我著,墨痕应作泪痕看!”该文谓:“有时候,梁嘉彬向学生讲近代史时,忍不住就会痛哭失声,学生也无不动容而正襟危坐,断断续续的呜咽之声,正是史家的无奈,也是对学生的鞭策。”作为后生晚辈,从墨痕与泪痕之中,看到一位饱经忧患的前辈学者,对经历百年屈辱的祖国的一颗赤子之心。前辈学者在史学研究中的爱国主义传统绝不能淡忘,而应该继承和发扬!我近期的主要工作,就是要做好《梁嘉彬史学文集》的出版工作,作为对这位在中国沿海边疆史的研究卓有成就,而终身充满着爱国爱种的赤诚的前辈学者的最好回报。

当中国海洋意识遭遇大陆文化

——以闽南人的海洋发展夭折为例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 庄国土

随着近 30 年中国崛起的加速和国家经济利益愈来愈依赖海洋发展,“海洋”及其衍生的论题如“海洋权益”、“海洋经济”、“海洋文化”、“海洋社会”,乃至“海洋政治(含军事)”、“海洋社会学”、“海洋管理学”等概念和理论不断推出,一些学人极力呼吁应建立相关学科加以研究。众所周知,长期在大陆文化主导下的中国,海洋意识向来缺少发展空间。当海洋利益突然扑面而来时,疾呼在人文社会科学层面加强海洋研究也在意料之中。但中国现代学科几乎完全引自西方,西方现有的学科理论,无不已经重视海洋因素的影响。如在现有各种人文社会科学中另设各类涉海相关学科,则逻辑上现有学科应另加上“大陆”二字,既无必要,也不科学。但如在“文化”学科中另设“海洋文化”学科,总成涉海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尤其是凸显海洋意识的重要性,则较为言之成理。

近年来,以海洋为主题的研究成果迭出,蔚为热潮。即使是以“海洋文化”(或海洋文明)为主题的研究成果,除少数总结涉海风俗的研究以外,绝大多数都以如何获取海洋权利和资源及其经验或反思为目标。本文同意海权和海洋利益是海洋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但集中体现海洋文化的海洋意识,则还有进一步认识的必要。

一、海洋文化与海洋意识

“文化”的定义可能多达数百种。大体上,狭义的“文化”,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① 笔者以为,无论文化的定义如何,其核心是价值观念,即“人类为求生存与发展设计的价值体系及追求价值的行为方式”。^② 笔者讨论的海洋意识(maritime awareness),实质上也是在海洋文化层面上讨论关于海洋的价值观,也即对海洋及其价值的认识和追求这种价值的行为方式。

在不同类型文化(或文明)划分中,根据文化生成地域的划分大概是最为普遍的。地理位置及其自然条件对于文化性质和表现形式的影响至关重要。地理环境经由物质生产方式这一中介,给各民族、各国度文化类型的铸造奠定了物质基石,而不同生产方式的差异,导致文化类型的不同,直接影响着各地域人群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在诸多以地域划分的文

① 《辞海》,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 1965 年版,第 2937 页。

② 庄国土:《东亚华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华商网络、移民与一体化趋势》,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3 页。